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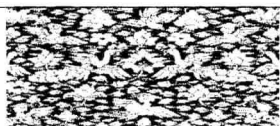


江建俊 主編

竹 林 學

的形成與域外流播





竹林學的形成與域外流播

主編◎江建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竹林學的形成與域外流播／江建俊主編，二 初版．

-- 臺北市：里仁，2010.04

面； 公分

ISBN 978-986-6923-89-0（平裝）

1.六朝文學 2.魏晉南北朝哲學 3.文學評論

820.903

99004892

· 本書經作編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竹林學的形成與域外流播

江建俊 主編

校對人：作編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rn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月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 600 元

ISBN：978-986-6923-89-0（平裝）

序

緊接著《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一書的編輯出版，獲得良好的迴響。故於執行國科會「竹林文化之形成、流播與影響——以中、日、韓為考察對象」三年期計畫之第二年，我們又召開一次「竹林學的形成與域外流播」研討會，以域外竹林研究成果的評介為主題，邀請日本東北大學佐竹保子教授、福岡大學松浦崇教授、金澤大學李慶教授、關西大學博士候選人蔡麗玲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劉苑如教授及成大中文博士生劉家幸撰寫日本的竹林學；韓國祥明大學沈禹英教授、世宗大學姜必任教授撰寫韓國士人對竹林七賢的接受；另由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屏東教育大學李美燕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王美秀助理教授及高雄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林佳燕、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葉常泓則分別評論法國漢學家侯思孟、弗朗索瓦·余蓮、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美國漢學家韓祿伯及英國漢學家翟里斯之竹林學。另由中央大學講師顧敏耀就台灣古典詩中的竹林七賢為主題加以評介。而本人則除了追蹤竹林學之形成、七賢原著之善本與後人研究七賢之專著，兼及歐西、日、韓、越南等漢學界之竹林研究概況及社會、文化、藝術方面的七賢遺跡，對已作為文化符碼的「七賢」形象，藉著異地之再現而得以窺其全貌，此為學界未曾有的嘗試。

緣中國學者使用中國本土語言，用自己的話語系統，受中華文化薰陶，思想理路無形中也受「中國」民族性之牽絆。每個研究者對文本的領會與掌握不同，是以各個理論架構及思想

特點自亦不同，加上歷史時期的哲學思潮各有特徵，文本在每個時代所折射的意涵隨時變化，文本之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是由各個時代有不同之詮釋來呈現。

鄰國日本、韓國、越南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中國之經典深深的影響鄰國之思想文化、生活禮儀，其歷代學者對文本的詮釋雖受個人學思、時代環境及其本國思想文化的牽制，但總仍存有文本之精神意趣。其至於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經典的詮釋，其進路就少有銜接，以其有自己的文化語境、文化理路，用西方的文化理路來詮釋中國之經典，偶可另闢蹊徑而妙發新義，然常亦因其誤解原典，引至所作深淺之論，竟「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在各為其解，各有訴求，各有所重下，所有的詮釋每每難得其本義、真義。緣詮釋是開放的，隨時、空之不同，容許人各異詞、家各異說，其中實無優劣高下可言。透過與西方漢學家的對話，瞭解其對七賢的看法，無形中擴大了學術視域，由之，也可能發覺竹林的新精神，發覺竹林七賢的豐富內涵，是以可從七賢中找自由精神、找超越意識、找處亂世的智慧。

「七賢」乃中國文化上一組鮮明的知識份子，先是被定位為「名士」，又被定位為「文士」，也有的視之為「高士」、「隱士」，或疏離於現實政治之士，是時代的批判者，是否棄現實禮教，追求自我的異端，故亦可視為清士、高士、逸士、方外之士、任放之士或賢者。「竹林意象」即立基於此，竹林之「傳說」，可展延為詩文之典故、戲曲小說的題材，並開發為各種藝品，而寺廟樑楹壁畫之圖錄七賢，乃視之為清心寡欲、超拔脫俗、優雅安閑的形象，又賞七賢間之神交意契及文采風流；

至於大量的畫作，亦因其隱然成為名士典範，以其風骨挺立，虎虎有生氣，故儼然成為士流偶像。揆實而言，七賢之精神已融入中國知識份子之生命血肉中，還影響於中華文化圈及西方漢學界。透過諸文之引介，遂可掌握竹林七賢廣被接受之迹，其傳播及影響不可不謂深矣遠矣！

此書原取名為《他者的竹林——竹林學的形成與流播》，乃著重域外學者對竹林七賢學術之探討而言。在這裡，並不存有「自我中心」或民族優越感，而視其他民族或國家為他者，而是站在不同民族國家之文化之差異，各自有完整而獨立自足的角度，在學術交流中，互為「他者」，此論文站在一體平觀的立場，則中國文化與日本、韓國、西方，各自有獨立自足的研究特色，彼此都可把別族文化視為他者，而後得以辨明其間的差別。後去其主標題，以求其簡暢明白。

感謝里仁書局徐秀榮先生長期關注「竹林學」的發展，並大力贊助系列專著之出版。也感謝各篇論文之撰稿者。而本計畫之助理高師大博士生陳雅萍任事之精誠，在其細心疏理、校對與排版下，加上里仁書局編輯曾美華小姐對出版業務的嚴謹要求，力求美善，使本書得以雅致之面目出現，在此一併謝之，是為序。

江建俊于成功大學中文系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二日

目次

序·····	江建俊·····	I
竹林七賢「傳說」考·····	松浦崇·····	1
日本近半世紀「竹林七賢」研究狀況·····	佐竹保子·····	49
吉川幸次郎的阮籍研究·····	李慶·····	103
韓國現代「竹林學」研究概況·····	沈禹英·····	127
竹林之遊在韓國的受容及其發展·····	姜必任·····	151
千古驚知己——法國漢學家侯思孟的阮籍嵇康研究 ·····	程章燦·····	185
凝視山濤——以日本《山公啟事》研究為主所展開的知識系譜 ·····	劉苑如·····	207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 (R.H. van Gulik) 之《嵇康與〈琴賦〉》述評 ·····	李美燕·····	231
翟里斯《中國文學史》中的竹林七賢·····	王美秀·····	271
竹林學之形成——從域外竹林七賢之流播證成 ·····	江建俊·····	295
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余蓮論「竹林七賢」的再商榷 ·····	林佳燕·····	351

- 大上正美的竹林七賢周邊研究評介——以《阮籍·嵇康之文學》
為範圍……………蔡麗玲……………375
- 複雜者及其綜理者——評介韓祿伯（Robert Guy Henricks）之
《嵇康（223-262）：其生平、文學與思想》
……………葉常泓……………417
- 竹林和音——《世說》七賢形象對角田簡《近世叢語》之投射
與影響……………劉家幸……………467
- 文化符碼的歷時衍變與異地再現——台灣古典詩中的竹林七賢
……………顧敏耀……………527

竹林七賢「傳說」考

松浦崇

日本 福岡大學人文系教授

提要

竹林七賢傳說，與東晉時代的「清談亡國論」有很深的關係，竹林七賢的重要資料——袁宏《名士傳》與戴逵《竹林七賢論》，在清談派與反清談派對立的時代，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創作的。「竹林之游」實際上只是個傳說。這樣的想法已成了定論。但是，最近有人發現了「竹林七賢亭」的遺跡。關於竹林七賢「傳說」的存在，筆者根據三十二年前所寫的拙論，在此進行論述。

關鍵詞：竹林之游、袁宏《名士傳》、戴逵《竹林七賢論》、清談亡國論、竹林七賢亭

一、袁宏《名士傳》與戴逵《竹林七賢論》

生存於危險的政權交替的魏晉時代的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以及王戎，即所謂的「竹林七賢」，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稟賦着他們獨特個性和象徵意義的一批人物。他們極富個性的行動和思想，給如今的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啟發，也帶來了飽含趣味性的思考。對於竹林七賢，後世的評價很多，有讚揚有否定，他們的行為還被種種混有世間俗說的

歷史資料傳言開來，因此後人對他們的偏見和誤解很容易產生。

但是，根據最近對竹林七賢的研究來看，有種觀點是認為所謂的「竹林之游」只不過是東晉時代的一個謠言而已。¹可儘管如此，為什麼東晉時代會有竹林七賢之游這樣的傳言呢？這個問題並未明確解答。

以下資料可以證明竹林之游只是東晉時期的一個謠言：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世說新語·傷逝篇》）

這是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在回想與嵇康、阮籍一起竹林之游之事。這個註解，曾被東晉的戴逵在以下他的《竹林七賢論》中引用：

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世說新語·傷逝篇》註引《竹林七賢論》）

在這裏，戴逵引用了庾亮（字文康，289-340）「這樣的故事在西

¹ 何啟民《竹林七賢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福井文雅《竹林七賢についての一試論》，《フィロソフィア》37，早稻田大學哲學會，1959年。松本幸男《阮籍の傳記-竹林の清遊に對する疑問》，《立命館文學》343・344・345，1974年。

晉時代未曾有耳聞，只是東晉時期突然出現的好事者的杜撰而已」這番話，從而斷言前面所訴的只是「世間俗言」。這個叫庾亮的人，與王戎（234-305）共存於西晉時期，並與王導共同在東晉初期主持政治的人物。所以庾亮的發言是很值得信賴的，關於竹林之游只不過是東晉時期所做的一個謠言這點，僅從這一資料看，也能較清楚的辨別²。

關於竹林之游只是謠言，從當時的七賢的詩文中沒有提及此游的內容，以及從七賢每個人不同的立場出發來推測，大概這的確是個事實吧。但是，說竹林之游完全是個謠言也並非就把問題解決了。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東晉時期社會上忽然盛傳起竹林七賢，人人關心起竹林七賢了。比如，在陶淵明（365-427）著作的《聖賢群輔錄》中，列舉了以阮籍爲首的上述竹林七賢的名字後有如下文字：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孫統又為讚。（陶淵明《聖賢羣輔錄》）

在這裏提到的袁宏、戴逵、孫統，都生活在東晉時期（317-419）。把竹林七賢與天竺七僧類比的《道賢論》的作者孫綽，著作中

²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載臧榮緒《晉書》是將王戎竹林之遊的回想以與向秀幾乎同樣的話語描述出來，以《竹林七賢論》的俗傳批判等位基礎，推定回想竹林之遊的或許是向秀。即便如此，疑問仍然存在，向秀《思舊賦》是對過去的懷戀，但這是與嵇康、呂安的交往，並不是竹林之遊。竹林之遊得回想，根據王戎與向秀兩者的話流傳下來，這也可以看出竹林之遊只不過是一種謠傳。頁358。

最早記錄有竹林之游的資料之一的《魏氏春秋》及《晉陽秋》的孫盛³，也都是東晉時期的人物。另外，在王羲之（307-365）的《蘭亭序》裏，具有代表性且成為了竹林之游形式的開山鼻祖的分組集會，漸漸興盛起來也是在東晉時期。也就是說，東晉時期，將竹林七賢作為對象而有的傳言、贊揚之類接二連三被書寫，作為東晉知識分子代表的竹林七賢成了極其重要的存在。

為什麼東晉時期竹林七賢成為了人們一致關心的對象呢？這並不單純是對竹林七賢的研究，而是在更廣泛地考慮到六朝貴族社會基礎上要進行研究的重要問題。

因此筆者略作小論，列舉東晉時期的代表性知識分子，也是竹林七賢傳聞記錄者的袁宏和戴逵，同時對有關袁宏《名士傳》及戴逵《竹林七賢論》中的性格、思想史的意義試著進行思考。

我特別列舉這兩個人的著作，是因為他們是最早將竹林七賢分為一個群組來寫傳記的，因此，這兩份著作是在了解竹林七賢事跡基礎上貢獻出來的珍貴資料。

但是，一直以來對竹林七賢的研究大多是在將數量較少的傳記資料拼合起來，構成新傳記。這的確是有必要的，因為可以達到某種程度上期待的成果，但也總是感到要達到更深層次的研究卻不夠。為了有進一步的成果，就不得不去了解與竹林

³ 竹林之遊的故事最早記載於《三國志·王粲傳》註所引用的《魏氏春秋》。此外，在《世說新語·任誕篇》與《世說新語·排調篇》中也有記載。劉孝標引註《魏氏春秋》，劉義慶在孫盛的歷史書裏得到了材料。

七賢相近時期生存著的人是怎麼看待竹林七賢的。不去考慮袁宏、戴逵他們是帶著怎樣的執筆動機與記錄態度來書寫七賢傳記的，卻將絕對的信賴放入他們留傳下來的記錄資料中，構思七賢的傳記這樣的研究態度，這是有必要反省一下的。

筆者正是出於這樣的觀點，對僅以目前為止的傳記資料來看待袁宏《名士傳》和戴逵《竹林七賢論》的存在意義，從根本上來進行質疑。筆者試著思考已經散佚並且內容基本上都已不存在的這兩本書的寫作意圖，有著怎樣的結構和內容，和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我認為這麼做興許會使對於東晉時期的知識分子——竹林七賢的一部分看法變得明朗點吧。

二、袁宏與戴逵

袁宏（328-376），字彥伯，陳郡扶樂（河南省）人。在他的祖先中，有曾活躍於曹操部下裏的袁渙，有曾擔任過西晉侍中的袁獻，因此袁宏可以說出身於書香門第。但是，由於父親袁冒的過早辭世，袁宏從年輕時就被困苦生活所迫，參加運送租稅工作，自己經營生活。不過滿腹經綸的袁宏，再一次詠誦自作的《詠史詩》時候，偶然被當時的大貴族謝尚聽到，自此他的才華得到了謝尚的認可，並成了謝尚的參軍。另外，他還成了當時叱咤一時的桓溫的幕下，歷任了記室、吏部郎等職位，並在有權勢者桓溫的庇護下，文學上的名聲顯着起來。《三國名臣序贊》（《文選》47），三十卷《後漢紀》等優秀的歷史著作，都作為他的代表作流傳至今。後來他任東陽郡太守。孝武帝太元元年（376），49歲的袁宏逝世。

回顧袁宏的生活方式，也許是因為年輕時期不得志緣故，

能看出他有迎合權力者懦弱性格的一面⁴。不過與之相反的，他也有希望與當權者區分開界限富有氣魄的一面。袁宏在接受桓溫優待的同時，也據理力爭，絕不僅僅是對桓溫妥協。此外，袁宏的這種處世態度受到了當時處於清談界領軍地位的謝安（320-385）的高度評價。他還與很多當時的清談界的人士保持着往來。

戴逵（330？-396），字安道，是與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223-262）同鄉——譙國鉅縣人。他在年輕時就很博學，喜歡談論，擅於文章，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他從師於豫章（江西）的范宣（292-345），並認真致力於學問研究。范宣，是以莊子思想為基礎，放達行為，鄙夷當時輕薄世風，⁵於民間潛心研修儒學，為人們著說莊子思想。戴逵崇拜這樣的范宣，而范宣也被戴逵的誠意所感動，做主將自己兄長的女兒嫁給了他。但是，沒過多久戴逵還是離開了范宣門下，移居到會稽的剡縣（浙江省嵊州）。他在那保持高尚節操，過着隱遁生活，數次拒絕任官的命令。⁶太元二十一年（396），終享天年而逝。

⁴ 例如，聽到袁宏成為吏部侍郎的王獻之（344-386），立刻將詆毀袁宏的信件寄給了郗超（336-377）《世說新語·品藻篇》。然後，郗超在寄給袁宏的信件中指出袁宏缺少戴逵和謝敷的一些品質，這促使袁宏奮發圖強。《恒任之風》是說要忠於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⁵ 「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晉書·范宣傳》中有如此記載范宣的批判之言。

⁶ 任官的命令少說也有四次。第一次：移居會稽隱居前，太宰聽到戴逵高

戴逵晚年主要的活動是雕刻佛像，並且對佛像研究有很高的興趣。他給當時廬山教團的創建者慧遠（334-417）送去了寫有自己苦惱的《釋疑論》，還和慧遠的弟子的周續之（377-423）進行了關於命運的爭論。恐怕戴逵是因為即使自己處於隱遁生活中也難以滿足自己無法解除苦惱的緣故，從而求助於佛教的吧。

如上所述的，都是有書寫竹林七賢傳言的兩人——袁宏與戴逵，他們的生活方式卻正好完全相反。袁宏是在桓溫與謝安的底護下發揮文才的，而戴逵是終生不仕官，皈依於隱遁生活與佛教，保全終生。可能正是與這樣的兩個人完全相反的兩種生活方式相符合對應的，兩個人撰寫的《名士傳》與《竹林七賢論》也是極其相對稱。

三、袁宏《名士傳》

爲了展現袁宏《名士傳》的特點，引用如下資料：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世說新語·文學篇》）

超的琴技，於是希望他出任武陵王司馬晞的手下，戴逵以「我戴安道與王室中的官員是合不來的」為由拒絕；并破琴而大怒；第二次：會稽隱居後的太元十二年（387）；第三次：太元十五年（390）；第四次：太元十六年（391）。尤其是第二次，由於戴逵難辭郡守與縣令的強求而逃往吳國，隱藏與王珣的別館裏數十天。

據此，我們能理解謝安常說的袁宏的《名士傳》是根據西晉之前的傳言所編撰的，其內容包含了與「盲目崇拜」相類似的民間傳說這樣的觀點。因此，劉孝標在《世說新語》註釋中寫到：

宏以夏侯太初（玄—筆者注，以下同樣）、何平叔（晏）、王輔嗣（弼）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濤）、向子期（秀）、劉伯倫（伶）、阮仲容（咸）、王濬沖（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楷）、樂彥輔（廣）、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衛叔寶（玠）、謝幼輿（鯤）為中朝名士。（《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註）

袁宏將夏侯玄等稱為「正始名士」；將阮籍等稱為「竹林名士」；將裴楷等稱為「中朝名士」。此外，從《晉書·袁宏傳》與《隋書·經籍志》來看，袁宏的《名士傳》似乎可以分為《正始名士傳》、《竹林名士傳》、《中朝名士傳》的上中下三卷。⁷也就是說，袁宏所著的竹林七賢之傳準確來講是《竹林名士傳》。

⁷ 《晉書·袁宏傳》中，記錄了他撰寫的《竹林名士傳》三卷，這些就如吳士鑑及黃逢元在《補晉書·藝文志》中指出的，但只是列舉了一部分而已。雖然袁宏《中朝名士傳》并未找到，但被認為是《中朝名士傳》續篇的《江左名士傳》却被劉義慶保存，其存在性也可被證實。儘管《名士傳》與《竹林七賢論》都已經散佚，但若試著從《御覽》等的類書與《世說新語》的注引中所保留的內容看，也可確認有關《正始名士傳》的注引有三條，《竹林名士傳》十五條，《中朝名士傳》十二條，以及《竹林七賢論》三十九條。但是，《竹林七賢論》裏還存在很多不明確的地方。

袁宏寫《名士傳》的意圖之一，從他一將此書寫好就呈現給謝安這一行動可推知，就是取悅謝安這種權勢者。⁸但是，如果單從現實的意義來看，卻也應該重視到這部史書產生的思想史背景。

根據袁宏對於名士的分類，「正始名士」是指活躍於魏朝的齊王芳年號，即正始年間的人物；「竹林名士」是指在魏晉時期這樣一段政權交替的時期裏，游玩於河內山陽（河南省焦作市）之地的一群人。另外，「中朝名士」是指在西晉時期（265-316）繼承竹林名士中最無視禮教的阮籍的行動，徹底的突破禮教的束縛，⁹沉溺於放蕩不羈的享樂主義的人。這些以四友、八達、八伯自稱的人，因為活躍於惠帝元康年間，因此又被稱為「元康名士」。

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因為不能容忍元康名士的行為，從內部開始了對他們的批判。從著有《崇讓論》的講述謙讓的道的劉

⁸ 《世說新語·賞譽篇》裏也記載了「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一段話。王承活躍於西晉初期，在諸多名臣中數一數二。袁宏在《中朝名士傳》裏對這個人的行動大加贊賞，令人驚訝的是他每每有新作就稟告上層。這不得不說有些阿諛奉承之意。

⁹ 中朝名士繼承的只是阮籍的行為，並不是所有的七賢。從王隱《晉書》：「魏末阮籍嗜酒荒放……其後貴遊子弟……皆祖述籍……」（《世說新語·德行篇》註引）的記載以及劉琨《答盧諶書》、干寶《晉紀總論》、葛洪《抱朴子·刺驕篇》等的初期反清談派的論著來判斷，均是將阮籍作為批判的對象。關於這一點，參照前注1福井文雅《竹林七賢についての一試論》，頁97-98。